

20 世纪武侠小说的文学史书写

李勇 李欧

摘要：本文关注的核心是 20 世纪武侠小说进入文学史写作的进程及其实质，考察了武侠小说进入文学史书写的历程及其在文学史书写中的比重和评价。据此认为，到目前为止，武侠小说的文学史版图是不完整的、模式化的。这是特定时期文学体制对武侠小说“改写”的结果。最后，就再现真实版图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20 世纪武侠小说、文学史、权力话语

一 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书写中的比重

20 世纪是武侠小说发展史上的黄金期，曾先后掀起两次高潮。作为 20 世纪通俗文学的强势类型，它不仅见证了通俗文学的兴起、发展、鼎盛、没落和再兴盛的历程，而且折射了大众心态和社会变迁。纵览 20 世纪武侠小说的创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其实绩及影响，武侠小说都应在 20 世纪的文学史版图乃至文化版图中占得醒目的一角。

从 1904 年到 2004 年，中国文学史已逾 1600 部，其中现当代文学史就有 200 余部^[1]，在这 200 余部文学史构描的 20 世纪小说版图中，武侠小说的出现微乎其微。下表是部分统计情况：

类别 作者、主编	文学史书名及出版社、出版年限	涉及武侠小说的内容	观点摘要或关键词	全书总页数	所占比例
范烟桥	《中国小说史》，秋叶社出版，1927。	289, 299—300 页	是民国小说全盛时期之沸点；为哀情小说潮流过后之新潮；可以论古昔，察世变矣	339 页	8%
冯光廉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62—266 页	以历史和现实题材呼唤传统美德，并借以牵动人们的爱国情怀	610 页	8%
乔福生 谢洪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	121, 128, 381—382 页	民族矛盾和斗争；思想内涵恢宏深广；反映民不聊生的现实	574 页	1%
孔范今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1652-1656 页	逃避现实的精神天地；精神升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锦绣河山的向往	1666 页	3%
张炯、邓绍基、樊俊等	《中华文学通史》第九卷，华艺出版社 1997	455—456, 519—524, 529 页	新的现代意识；在男欢女爱中追求人类原始的带有野性的欲的本能；民族大义；家仇国恨，为国为民；小说昭示，人的成功与人的性格、品德没有关系，只与机遇有关	734 页	1%
田中阳等	《中国当代文学	738—45 页	爱国爱民，追求高尚美的	745 页	1%

	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人生；民族大义；人民本位，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		
黄修己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中山大学，2000	304—309页	反武侠的趋势；人性；鲜明的历史观	500页	1%
朱栋霖、丁帆	《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39-240, 246, 250-252页	人性的深刻和复杂；现代意识；雅俗的界限；文学大师	594页	1%
金汉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676—677页	情节离奇；鲜活的人物形象；人生哲理；思想辐射力深广	692页	2%
吴秀明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1110—1117页	现代意识；文体创新；爱国主义；语言别具一格	1222页	7%
唐金海、周斌等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东方出版中心，2003	395—396, 411—413, 418—419, 617—618, 649—653, 658—661等，共计16页	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节；反封建和反帝主题、爱国主义情操；民族的心理基质	746页	2%
李贽等	《中国当代文学史》，科学出版社，2004	346-348页	忠于国家，讲义气；抵御外辱；对父母孝道；很强的民族性	356页	8%

从统计数字看，长期以来，20世纪武侠小说差不多都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200余部现当代文学史只有十几部提及（不包括几部专门史），而且时段大致集中在二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后的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

不管怎样，武侠小说毕竟进入了文学史，虽然分量不够，但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有论者认为，武侠小说进入文学史搅乱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现有格局，打破了雅俗对立的局面，因而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大事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挖掘、整理和梳理；即武侠小说进入文学史，表明了作为大众文学叙事话语代表的武侠小说已经得到主流话语、权力话语的认同；而且，文学史又常常作为大学文学专业的教科书，因此，进入文学史，表明它已经被以学院体制为代表的主流学术系统所接受，已经由边缘走到中心。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承认武侠小说可以与公认的文学经典并列了。^[2]不过，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中占的版图是否得当，常被略而不论；论者们津津乐道的是“进入”这一事件，从接收语境、大众心理学、文化资本理论等等入手去展开论述，实质上是沿着这一事件的边缘走了一圈。因为这些论述缺乏对武侠小说文学史书写的话语本身进行恰当的分析，故武侠小说文学史书写的意义、书写的功能仍然是不清楚的。我们认为，文学史是特定的知识和意识形态话语权所掌控的领地。武侠小说能进入文学史是特定时代的文化境域压力的一种表现，可以说，20世纪武侠小说进入文学史，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书写，是学界、商界、现代传媒的“合谋”以及大量延伸作品的蔓

[1] 《中国文学史出版泛滥-1600余部有多少值得信赖》，《南方都市报》，2004-11-30。

[2] 李秀萍，《消费时代的文化资本之争——也谈金庸小说的经典化》[J]，《中国比较文学》，2004,(2)

延所造成的。要真正理解这种表现，不仅仅是看已经被书写，更重要的还是看它是如何被书写，以何种角色被书写。应该指出，从其被书写的方式和内容来看，20 武侠小说得以进入文学史只不过是权力话语改写或收编的一种方式，并不能表明武侠小说本身的特质、价值得到彰显，以及合法性得到真正的实质性的认同。

二 80 年代以前：零星或隐性书写

最早将 20 世纪武侠小说写入文学史的是小说家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他还著有《民间通俗小说史略》和《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等），其中专设“最近之十五年”一章来谈民国小说。作者以一个作家的特别眼光，对清末民初的小说作了一番巡礼，并表述了包含了他对武侠小说的看法。他极力站在“新文学”的立场，用“新文学史观”来评述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他认为，武侠小说等通俗小说的盛行，是对枯竭、苦闷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慰藉。总的看来，范烟桥以及同时代其他人，如谭正璧等的文学史，基本上采用直观式、领悟式、随感式的方法对现代武侠小说进行了社会批评、道德评判与艺术鉴赏，而且所涉及的作家作品也极其有限。他们认为，“清末至今，作侠义小说的人仍很多，然除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外，大都不足弥述。”^[1]除了范烟桥等人，当时的其他文学史鲜有提及，提及也不过寥寥数语。

武侠小说在这一时期能够进入文学史的写作，大致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是与民国时期掀起小说史的编撰热潮有关。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小说史学建立的时期，是传统的学术范式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变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小说史，其中不乏对当前文学作品介绍的专著；其二，与武侠小说在这一阶段获得空前的发展有关。大约自 1920 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问世，并陆续拍成十八集《火烧红莲寺》电影而风靡全中国起，中有赵焕亭的推波助澜，武侠小说遂成为一种为社会大众所瞩目的小说类型，与言情小说、社会小说鼎足而三，且有一枝独秀之势。30 年代“北派五大家”先后崛起于华北文坛，分别以元气淋漓的系列代表作，翻空出奇，建立不同的流派风格，武侠小说一跃成为我国当时民间最有势力与魅力的大众读物。这一事实使文学史的写作者无法完全漠视它的存在。但是，武侠小说虽然进入了文学史，它的文学史地位却并没有获得当时主流文学界的认同。鲁迅、郑振铎、茅盾、瞿秋白，甚至曾以写武侠小说为营生的宫白羽、张恨水、郑逸梅等，都对武侠小说口诛笔伐。这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震荡之中，学者很难对武侠小说进行潜心研究，因此，在居于种族灭亡、国家衰败、帝国侵略和毒害社会等政治立场的话语系统的诠释框架下，所生产出的道德批判式的论述，已自觉或不自觉的排除、压抑武侠小说可能具有的文化价值和丰富的社会生活意涵。

49 年以后，在大陆，武侠小说的写作被禁止、边缘化了，只能转移到香港台湾的文化市场去发展。有意思的是，表面上看武侠小说没有进入文学史（崛起于三四十年代的旧派武侠小说，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正统的文学史中鲜有被提及，更遑论其地位），但是，侠义形象用革命化的叙事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却获

[1]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M]，上海：上海光明书局发行，1930，第 95 页。

得一种间接的书写。如 50 年代的革命英雄传奇《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智取威虎山》、《林海雪原》等作品，虽然是在革命的话语下，回应历史经验及政党意识形态而创作的小说，但其深层内涵中仍有许多内化的侠义叙事装置，如兑换复仇主题的传统话语内涵，去建构成贫富对立、最终导向阶级对立的话语等，但是英雄们的身上仍呈现出传统文学中那种除暴安良的草莽英雄、济世豪侠的特性^[1]。这些小说恰到好处地将侠文化主题的一般性与当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有机地整合起来，在革命化或泛政治化叙事中隐含着大众化审美情趣和民间性艺术思维的底蕴，侠义英雄借着“革命”的法衣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在被国家权力话语的改造和利用的前提下，隐性存在着的民间侠文化得到合法的言说，“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官方的文学史中，武侠小说只能以一种变体形态委曲求全的隐藏在文学史的书写机制中。”^[2]

如果说，80 年代以前，文学史对武侠小说进行的只是零星的言说或隐性书写，那么，作为一个具体的文化的言说概念，有意识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展开大规模的书写行动，则是 90 年代的事。“变体”的武侠文学形态开始以“正体”的面貌在文学史中登场，这是世纪末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冲击、文化体制的改革开放、以及重写文学史浪潮、港台新武侠小说在内地的流行、侠文化在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方面的功能被重新认识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三 90 年代后：书写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已经愿意公正宽容地承认武侠小说的存在价值以及它文学史的地位，并试着用一些概念范畴去理解它、阐释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为武侠小说甚至通俗文学建立一套比较适宜的批评话语。因此，在文学史书写的操作层面上，在阐释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个性特征（如复杂的主题、高度模式化的情节建构、文化隐喻与仪式功能、愉悦性及其与现代传媒的关系等）时，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失误。概括如下：

1、批评语汇的意识形态化

总之，金庸的武侠小说讲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道德，中国人的观念，忠于国家，讲义气，肝胆相照，抵御外辱，讲对父母的孝道，有很强的民族性……（李贽等，P348）

它既为多数读者提供逃避现实的精神天地，也会使读者“受武功侠气的感染而精神升华，得以在较高层次面对现实，”更有使读者建立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锦绣河山的向往，对人物情意的赞美的积极作用。（孔范今，P1655）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已经有一定的程式，作品、作家、流派的置放都有清楚的位次秩序。这其实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行使的意识形态霸权”（戴锦华语）。主流意识形态已构建好一整套的价值规范、趣味取向与操作方式，通过选择一部分作品确立为“经典”，同时又制造一套特殊的对经典的诠释话语的

[1]有关论述请参阅：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何新，《武侠文学源流研究》[J]，《文艺争鸣》，1988,(2);杨经建,《“江湖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小说创作》[J]，《天津社会科学》.2003,(4)

[2] 杨经建,《侠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小说》[J]，《文史哲》,2003,(4)

模式，来规定和制约着文学作品的阅读方式，提供所谓的“正确的阅读”，并以教育目的为出发点，读出作品的崇高。这种统一的批评，可以说，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阐释的基本思路。武侠小说也不例外。书写者似乎患了“艺术言语失语症”，他们在解读武侠小说时，所使用的竟都是一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语汇。这种宏大书写虽然读起来气势很盛，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切中肯綮，却是值得怀疑的。这样的上纲上线，将武侠小说的文本意义上升到民族精神与国家旗帜的高度，既远离了武侠小说自身的娱乐本质，又远离了真切的审美趣味，忽略了阅读文本的快乐与激情。

武侠小说历经史传文学、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等发展阶段，至 20 世纪它已成为一个有着自身的结构模式、叙事语法、人物生成程式的特别文类。长期以来，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学院派的文学史中，虽没有引介武侠小说，但因其在社会上具有的声誉影响，大量的受众者、强旺的文学活动能力等等因素，都使得武侠小说终于突破区隔而与纯文学共享文学版图的空间。但必须指出，由于受到文类的限制，武侠小说审美功能主要是指向愉悦性和游戏性，评价武侠小说主要应以此为基点，来辨析这些方面的能量。如果一味上纲上线，挖掘其文本中的宏文大旨、教育作用等等，无疑会犯过度阐释的毛病。

2、权力话语的强行“改写”

……选材严肃，题旨深刻，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民族矛盾和斗争，反映民不聊生的现实，揭露卖国贼的罪行，歌颂民族英雄的高风亮节。（乔福生，P381）

《江湖》全书紧紧围绕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节的主旨，浓墨重彩地成功塑造了霍元甲这一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唐金海，P411）

反帝主题为武侠小说增添了更多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情操，反封建主题使“英雄”与“儿女”真正实现了融合。（唐金海，P418）

这种书写的背后包含着的仍然是宏大的国家叙事，言说的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话语。这其实还是由权力话语编织的文学史。“在话语控制的意义上，意识形态不过是政治统治所巧妙体现出来的一种权力修辞学的游戏，文学史的书写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权力机制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符码化”。^[1]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重写文学史”其实就是对这种话语霸权的反抗和争夺。但在部分的文学史中权力话语的影响依然存在，它使书写者的品味、秩序意念、技巧的认定、审美的标准等都受到极大的牵制。因此，即便偶尔有边缘性文学跻身于由权力话语编织的文学史时，书写者也会据权力话语所需，对其强行改写，从而将其纳入主流的意识形态范畴。

二十世纪文学史并未给武侠小说预留版图，所以一旦武侠小说以一个异端的身分闯入，书写者不得不对其做出评判时，一些仓促上阵的学者，在接受异质类型的流行文化时，虽对既有的文化形式和建制产生质疑，但他们明显还没有对侠文化和武侠小说的发展史及其审美价值的核心范畴等有深刻的把握，在论述“武侠小说”时，一方面尽力取悦于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的读者，另一方面又在谨慎地回避主流意识形态所设立的禁区，力争把这个具有颠覆性的文类变成在既有的价值范畴可以接受的文类，运用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屡试不爽的话语模式进行统一的表述。

侠文化是一种潜行隐构的民间形态，缺乏精确的话语外延和严格的语义规

[1]陈思和语.转引自陈国球《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第 319 页.

范，必须借助于民间媒介得以传播。一旦主流意识形态借助权力话语对其进行合法化的命名——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和反抗精神是武侠小说的灵魂所在，贴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标签后，就表明武侠小说已“改造完毕”，取得了合法的文学身份。这种经过“改写”的武侠小说进入文学史，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对于武侠小说自身而言，只不过是获颁了一张“准看证”而已。

3、教科书式的书写

武侠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部作品（《多情剑客无情剑》）的语言句式短促，手法多变，随意挥洒虎虎生风，力避平铺直叙，行文跳越灵动。……融叙述与抒情为一体，尤其突出了主人公的情怀，极富表现力，充分体现了古龙在武侠小说创作中求新求高，求突破的艺术追求，而自成一派。（唐金海，P650）

……他的作品熔天道地道于一炉。金庸小说的语言雅洁、清俗，时时展现一种诗的意境，一种如画的境界。它不仅具有一般小说的所有特点，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欣赏价值，如果把它放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之林中，应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金钦俊.中华新文学史.广东高教出版社,1998,P601）

钱理群先生把文学史划分为“专家的文学史”、“教科书的文学史”、“普及的文学史”三种类型，而占上风的却是“教科书的文学史”。教科书式的书写，意味着必须放弃个体的欲望和趣味，接受集体认同的原则和程序，使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众人认可的模式化标准来书写集体的话语。因此，材料、观点上务必求平保稳，避免争论或失误。这样，文学作品的真实性、独特性与异质性便被同化掉了，相同时段的文学史虽然可表现为不同的叙事体，呈现的却是同一个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书写其实就是历史性的文学批评的整合和延伸，它对于当前发生的文学活动缺乏描述与评判的能力，必然存在着滞后性。譬如，就金庸的语言特色的研究当代论者就有许多精彩的论断

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1]

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他使中断了传统的白话语言起死回生……为现代汉语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语言。”^[2]

对于古龙则有

吸收了欧式的叙事手法，字里行间带一种特有的机智和气韵，在情节的铺张方面更注重了作者思想的闪现和场景的剧本式转换，这才是古龙笔法之神。^[2]

……

也许从这样一个思路出发，研究金庸、古龙的文字功夫，才能找到其为什么能进入文学史的一个原因。

文学史评判的失衡，是把“武侠小说”写入“20世纪文学史”过程中一个持续出现的现象。从对90年代以来部分文学史的书写情况来看，除了《中国现

[1]刘再复《金庸小说在廿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J].香港:《明报月刊》,1998,(8)

[2]李陀《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香港:《明报月刊》，1998,(8)

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对武侠小说的解读颇为精辟以外,文学史中的武侠小说的版图构描是不完整的,对其阐释是模式化的。而且,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评价时,大多只停留在对小说发展的外在表象的孤立断续地描述,局部问题上虽有突破,然而还没有很好地把握整个武侠小说史内在逻辑,对武侠小说史发展规律也没有加以科学的总结。一些文学史还暴露出文学信念的政治化、思维方法的简单化、批评心态浮躁、批评模式的单一化等缺陷。

四 如何再现真实版图?

既然认为文学史对武侠小说的书写是不恰当、不公正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有一个武侠小说的真实版图,再现这种真实版图是否可能,如何再现?

中国武侠小说历经数次变革,且每一次变革都带来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和思维性的转变,它有自己的结构体系、运作规律、自律性的价值与内在动力系统。不了解这一点,仅仅试图使用一般性的文学批评话语,对于武侠小说的剖析就可能陷入“虚妄与失衡”。欲摆脱这种“虚妄与失衡”的状态,还武侠小说以真实面目,首先应当摒弃以前那种单一的权力话语的叙述模式,将所有的立论都建构在严肃的学术分析和深入的作品解读基础之上,使用新的评述话语、观念、体例,书写个性化的武侠小说史。武侠小说的现实意义在于隐喻模式的文化共通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的文化意义胜于文学意义。“它把文化精神中梦幻、游戏、仪式的因素综合在一部作品中,通过个体的阅读实现它”^[1]。有特色的“文学史”都是个人阅读与集体记忆的结合。因此,我们提倡一种鲜活的原生态阅读感悟方式,将自己置在一个非常敏感的状态,去感受、去认识。例如,对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的解读,多数的文学史只看到了到处存在着的“爱国主义”,但其实,促使不肖生写《近代侠义英雄传》的真实动机却是提倡武术以及以提倡武术来发扬国威,而且就文化学意义上的价值而言,“它在运用武侠小说反映中西文化碰撞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要比一般意义上的‘鼓吹爱国主义’更高”^[2]。不止于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小说中所隐藏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与修辞——有关国族和身体想象的内涵。

其次,要建构多维度的武侠小说史。文学史中的武侠小说史的书写普遍还存有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演进,而忽视空间形态及其与时间形态内在交融的立体图景的现象。基本上是按照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性、艺术性及作家作品影响等“五段式”模式书写,缺乏对武侠小说存在的网络形态以及它的深层意义深度的阐释。这样,20世纪的武侠小说便被人为的切割为几大板块,它们之间的承传、变奏、互动以及与其他类型的文学的衔接和借鉴便无从考察。因此,要想重绘武侠小说的真实版图,揭示武侠小说本身的生命特质、文学身份以及文体交替、经典形成的那种复杂的生动过程,我们应当在史料的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撰著体例的推陈出新的基础上,配合着我们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文学史结构。这些维度应当包括地理维度、精神维度、文化维度等。如在对民国旧武侠小说的研究时,可以从京、沪、津三市互动的视角切入,使用“地缘

[1] 周宁《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J].《中国社会科学》,1995,(5)

[2] 徐斯年《我和袁良骏先生的分歧——关于民国武侠小说》[J].《齐鲁学刊》,2006,(1)

内涵”的分层研究法，即从作家籍贯地域、作家活动地域、作品描写地域、作品传播地域四个层序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观察与分析。这不仅可以使更真切地复原经过小说家重构的作品地域版图，更深入地揭示隐匿于作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地图，而且还可以由此探究小说传播与接受的特殊规律。

再其次，武侠小说作为当代最流行的文学类型，它的生产策略在当代文化产业的生产中具有典范意义，生产后的市场营销策略也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在将文学叙事衍生到其他媒介的叙事，如电影电视叙事，网络游戏叙事等等，它是非常成功的。从而，由武侠小说为核心，弥漫出一种似乎无所不在的武侠文化氛围，一种强大的文化场压强，极大的扩展了影响，似乎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种背景出发去探讨武侠小说，无疑论述将更为深厚，对把握、理解当代文学、文化更具深刻性。或许，这样建构的“文学史”的价值更大。

对武侠小说的这种多维结构描述，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框架，它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不同的叙述视野，多元的切入视角。即我们的研究视角可以从单一的社会学、政治学立场转向文化心理、审美形态、社会机制，市场运作的多向开掘和相互补充；可以运用神话学批评、原型批评、意象批评、范式批评、文化批评、心理分析、结构分析、计量分析、系统分析等多种方法。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更新的、更丰富的、更立体的文学活动图。

参考文献:

- [1] 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M]，上海：上海光明书局发行，1930。
- [2] 陶东风：《文学史的哲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3] 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 [5]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6] 陈国球：《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7] 温儒敏：《文学史的视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8] 陈飞等：《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

The domain of Xia—novels

—— Xia-novels in the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history

Li Yong Li Ou

Abstract: The article approaches the subject of Xia—novels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the process and substance of its entering into the literature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n the course and proportion of Xia—novels' being recorded in the works of literature histor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domain of Xia—novels i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fell into some certain patterns, and didn't reflect all the dimensions of Xia—novels,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transforming under the literary system of some certain periods. Finall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everal ideas about how to reproduce the domain of Xia—novels authentically.

Key words: Xia-novels in the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History, Authority Discourse

尊敬的编辑：

呈上一稿，谨盼能得到指正。

顺颂

编安

李勇 李欧

通讯地址：中国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邮政编码：610041

Email: li.ou@tom.com ouyangju2003@hotmail.com

电话：（028）66628854 13548017063

[作者简介]

[1]李勇（1972— ），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

[2]李欧（1954— ），男，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